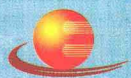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HUANTI YANJIU

#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 樊星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China Central Radio & TV University Press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樊 星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樊星主编.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ISBN 978 - 7 - 304 - 04921 - 8

I. ①中… II. ①樊… III. ①当代文学 - 中国 - 电视大学 - 教材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74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樊 星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策划编辑: 来继文

版式设计: 袁 鹏

责任编辑: 王清珍

责任校对: 王 业

责任印制: 赵联生

---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数: 22001~37000

版本: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B5

印张: 15.75

字数: 273 千字

---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4921 - 8

定价: 22.00 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目

# 录

|                                |         |
|--------------------------------|---------|
| <b>专题一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b> .....   | ( 1 )   |
|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      | ( 1 )   |
| 二、赵树理的小说 .....                 | ( 7 )   |
| 三、孙犁、周立波和柳青的小说 .....           | ( 14 )  |
| <b>专题二 当代小说中的革命叙事</b> .....    | ( 25 )  |
| 一、当代小说与革命叙事 .....              | ( 25 )  |
| 二、王蒙的小说 .....                  | ( 30 )  |
| 三、古华等作家的小说 .....               | ( 41 )  |
| <b>专题三 “样板戏”与当代的戏剧实验</b> ..... | ( 47 )  |
| 一、《茶馆》与“十七年”戏剧的发展 .....        | ( 47 )  |
| 二、《红灯记》等“样板戏” .....            | ( 52 )  |
| 三、《车站》等新时期戏剧 .....             | ( 58 )  |
| <b>专题四 “朦胧诗”与当代诗歌的探索</b> ..... | ( 69 )  |
| 一、“朦胧诗”出现的背景与争论 .....          | ( 69 )  |
| 二、蔡其矫、郭小川的诗 .....              | ( 78 )  |
| 三、北岛、海子的诗 .....                | ( 82 )  |
| <b>专题五 新时期乡土小说</b> .....       | ( 88 )  |
| 一、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变化 .....             | ( 88 )  |
| 二、路遥、贾平凹、张炜和陈忠实的小说 .....       | ( 94 )  |
| 三、莫言的小说 .....                  | ( 101 ) |
| <b>专题六 女性文学</b> .....          | ( 108 ) |
|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 .....              | ( 108 ) |
| 二、王安忆、铁凝的小说 .....              | ( 112 ) |
| 三、林白、陈染的小说 .....               | ( 120 ) |

|                   |       |
|-------------------|-------|
| <b>专题七 先锋小说</b>   | (128) |
| 一、先锋小说的出现和类型      | (128) |
| 二、马原、残雪的小说        | (132) |
| 三、余华的小说           | (139) |
| <b>专题八 新写实小说</b>  | (150) |
| 一、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 | (150) |
| 二、新写实小说的特征与发展变化   | (153) |
| 三、池莉、刘震云的小说       | (157) |
| <b>专题九 当代散文</b>   | (167) |
| 一、当代散文的发展与成就      | (167) |
| 二、金克木、张中行的散文      | (175) |
| 三、余秋雨、韩少功的散文      | (180) |
| <b>专题十 新派武侠小说</b> | (185) |
| 一、现代通俗文学与武侠小说     | (185) |
| 二、金庸的小说           | (190) |
| 三、梁羽生、古龙的小说       | (197) |
| <b>专题十一 台湾小说</b>  | (204) |
| 一、当代台湾小说的发展       | (204) |
| 二、白先勇的小说          | (209) |
| 三、七等生、张大春的小说      | (216) |
| <b>专题十二 台湾诗歌</b>  | (222) |
| 一、当代台湾诗歌的发展       | (222) |
| 二、余光中的诗           | (226) |
| 三、纪弦、洛夫的诗         | (233) |
| <b>参考文献</b>       | (239) |
| <b>后    记</b>     | (246) |

# 专题一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

## 学习要求

1. 了解“十七年”小说创作概况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2. 掌握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以及从《小二黑结婚》到《三里湾》再到《“锻炼锻炼”》的创作历程。
3. 掌握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的创作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其独有的地位和成就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来自农村，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题材小说还有着其他题材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既拥有着从“五四”新文学到解放区文学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形成的传统优势，还拥有着丰富多彩而又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素材和感受。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是最多的，作品也是最多的，成绩也是最突出的<sup>①</sup>，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出了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经典作品。

##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两个“传统”。“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村（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形成了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以揭示乡村疾苦、表现农民生活

---

<sup>①</sup>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3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艰辛、探索与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两大风格流派。“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农村（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传统，使“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解放区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创作中，这种创作趋势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在解放区文学的这两大题材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又是最先取得突破和形成影响的。

以1949年7月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开端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和发展。正如周扬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sup>①</sup>虽然，第一次文代会是长期被分隔在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但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还需要有一个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因此，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要是来自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

“十七年”文学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那时候的农村题材小说也不例外，也具有紧紧跟随时代发展、积极反映时代变化的强烈的现实性。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和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当时农村社会的重大事件，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完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后，革命的目标就对准了传统的土地私有观念，要求广大农民从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靠个人劳动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从几千年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中转变过来，走一条从未有过的“集体致富”道路，这不仅对于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是一场痛苦考验，也极大地吸引着许多来自农村、在感情上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作家的极大关注。因此，无论是较早出现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稍晚出现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显然，这不是一种作家创作的雷同，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sup>①</sup>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68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当时的农村题材创作，在新的农村生活鼓舞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农村（乡土）题材小说创作的风格特点。一方面，作家们以满腔的政治热忱，努力歌颂新的生活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表现出一种轻松欢快的“农村新生活的情调”。赵树理的《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一架弹花机》、《我的第一个上级》，刘澍德的《桥》、《归家》，孙犁的《村歌》，王汶石的《黑凤》，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禾场上》，西戎的《赖大嫂》，李準的《李双双小传》、《耕云记》，艾芜的《野牛寨》等，这些中短篇小说，大多通过农村家庭和婚姻的矛盾纠缠，反映农民新的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浓郁的民间风情和生活气息。另一方面，作家们又以爱憎分明的态度，围绕着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特别是在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集体主义思想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的斗争，表现出鲜明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1953年，李準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率先在农村题材创作中引入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被称作“当代小说中第一篇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sup>①</sup>。此后，在作品中是否表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便成为评价一部作品质量优劣的首要标准。同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三里湾》就因为矛盾冲突表现得比较温和而受到批评；虽然《山乡巨变》特意设置了比较尖锐的阶级斗争，但当时的评论家仍然认为“美中不足”，还缺少“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sup>②</sup>。稍后的《创业史》（第一部）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加强了力度，人物的阶级阵线分明，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至于大量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情景也受到了挤压，但评论家们则普遍认为，“比起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创业史》在正面表现农村革命力量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sup>③</sup>。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并都具有普遍的、积极乐观的明亮色彩，某些作家在创作中更带有对政策的简单图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看，这种特点的形成，并不是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当时社会现实对作家的社会要求，也是强调“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的必然结果。

① 郭志刚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1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②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读》，载《文艺报》，1961（2）。

③ 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载《文学评论》，1964（4）。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是在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同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其中，有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最值得注意。第一类形象是“先进人物”，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代表。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铁木前传》中的九儿、四儿，《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焦淑红等，他们乐观、自信，既有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又有知识文化和学习欲望，大多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作家们有意识地树立的学习榜样。虽然，梁生宝、萧长春、焦淑红等形象有较为明显的拔高的痕迹，并没有如实地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状况，但这正是当时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也是他们追求革命理想和创作理想的结果，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结果。第二类形象是“中间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代表。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能不够”，《铁木前传》中的黎老东，《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世富，《艳阳天》中的“弯弯绕”、“马大炮”等，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的苦日子里煎熬过来的，与乡村历史和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他们年长而智慧，对乡村生活有深刻认识，但又保守而怕穷，对“发家致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对走集体化道路这类新生事物则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排斥。但是，连作家们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些作家们竭力帮助甚至努力批判的人物，无意中却成为描写得最为成功的形象。第三类形象是“异己分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如《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的马之悦等，他们大多精明而能干，自负而自私，有头脑、有知识、有经验，又曾有光荣的革命经历，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但由于缺乏坚定的意志，热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变节者。第四类形象是“地主富农”，是农村中暗藏的阶级敌人的代表。如《山乡巨变》中的龚子元夫妇、《创业史》中的姚士杰、《艳阳天》中的“马小辫”等，他们大多凶狠而狡猾，曾有罪恶的历史，对穷苦大众有着深刻的仇恨。

从作家们对这些人物的阶级、性格和矛盾定位中可以看出，他们普遍都遵循着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就是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史，就是“先进青年”与“中间人物”、“异己分子”、“地主富农”的斗争史。作家们主观上是要为描写“两条道路”的斗争服务，但同时也在客观上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农村社会的现实性、残酷

性和复杂性。“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农村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并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成为当时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在民风民俗的描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写的乡村生态世界是中国新文学（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乡村人物塑造的丰富、表现乡村世界的广阔，还是在展现乡村生活的具体切实，尤其是在表现乡村生活的自在和积极面上，它都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sup>①</sup>即便是以阶级斗争理念来诠释农村生活的《艳阳天》，也洋溢着欢快、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呈现出鲜明的乡土特色。而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坛上是极为少见的，可以看做当代文学的意外收获。

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50年代末，一些在太行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山西作家，陆续回到山西，有意识地学习赵树理小说的风格和特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共同风格的农村题材小说，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乡音土调，史称“山药蛋派”；又由于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又称“山西派”；还因为他们当时多以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火花》为基地，也称“火花派”。“山药蛋派”虽然没有发表明确的宣言，却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他们从小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斗争和生活，对山西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分注重作品的社会功效，与赵树理一样，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时，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sup>②</sup>，都把自己看做农民中的一分子，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他们的“思想和形象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sup>③</sup>。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问题小说”的特点。“山药蛋派”的作家，还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追求，都具有大众化、民间

① 贺仲明：《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载《文学评论》，2006（6）。

②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08-26。

③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载《文学评论》，1962（5）。

化的特点。他们的艺术修养，主要来自地方戏曲、说书艺术、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和古典小说等传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风格。他们的美学理想，都是建立在通过写农民达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叙事手法上，追求故事动态发展、单线索推进；在结构安排上讲究有头有尾、依次进行，分段明确，交代清楚；在人物刻画上，强调情节生动、细节真实，用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性格和相貌，极少用静态描写和心理分析；在语言运用上，要求通俗明了，朴素自然。

50年代初，孙犁在担任《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的主编时，就有意识地指导和培养了京、津、冀地区的一批文学青年，发表了一批以诗化、散文化的美学风范为特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房树民的《花花轿子房》、《引力》等，形成了“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冀中平原地区的乡村生活，以孙犁为榜样，以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为主要特征，或描写冀中人民的斗争史和情感史，歌颂劳动人民的纯净朴实的美好品德，或记录冀中平原清新秀美的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表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人情美、人性美，形成了朴素自然、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

在新文学史上，湖南人才济济，巨匠迭出。沈从文、丁玲、周扬、张天翼、叶紫、周立波等都是文学名家。他们的作品，特别是沈从文和周立波描写湖南本地民俗风情的作品，对湖南的青年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1954年周立波回到故乡湖南后，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并连续担任过两届省文联主席。在周立波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周健明的《柳林前传》、谢璞的《二月兰》、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和《爬满青藤的木屋》、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和《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谭谈的《山道弯弯》、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等有着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湖南作家为主的“茶子花派”。“茶子花派”是一个乡土化与诗意化相结合的文学流派，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节令习俗、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努力追求一种风俗画和田园诗的风格。

在“山药蛋派”（特别是“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是否具有真正的流派特征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则是有目

共睹的。这些流派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正是通过农民生活中的民俗风情来表现农村社会中的时代风云。所以，“十七年”时期是我国的地方方言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大量运用的时期，也是我国的乡风民俗得到大规模表现的时期。在过去，这些农村题材小说曾因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代风云而产生广泛影响，而在今天，这些农村题材小说又因记录了各地农村的民俗风情而重新受到尊敬。

## 二、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是一位不多见的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的作家。但是，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曾获得广泛赞誉，除《邪不压正》<sup>①</sup>外，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地板》、《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小经理》、《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几乎所有作品都备受推崇，甚至被树为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即所谓的“赵树理方向”<sup>②</sup>。而在当代文学史上，除《登记》外，他的《三里湾》、《“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互作鉴定》、《卖烟叶》等几乎所有作品虽然也曾得到过赞同和支持，却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始终处于“褒贬毁誉之间”。

1950年，赵树理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了评书体短篇小说《登记》，其思想主题也同作家在40年代创作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一样，是一篇反映农村青年与封建思想作斗争、争取婚姻自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的作品，被看做《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登记》虽然为宣传而创作，但由于作家熟悉农村生活，通过对罗汉钱、打老婆、说媒等中国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塑造出了具有浓厚民间文化特色的小飞娥等形象，包含着丰富

① 《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48年10月13日、16日、19日、22日连载。作品描写的是一个中农女儿软英的婚姻故事。软英先被地主刘锡元的儿子看中，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下河村解放后，农会主席小昌又唆使成为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最后在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软英与情郎小宝终成眷属。

② 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在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中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地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人民日报》，1947-08-10。

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的审美功能，并没有成为一篇单纯的政治宣传品。后来，作品又以《罗汉钱》为名，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各种戏剧戏曲，并搬上银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面貌。但作品最成功的部分，并不是办农业社的过程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新的时代环境中农民们的日常生活，农民们如何在个人致富和集体致富的社会矛盾中进行家庭矛盾的调整、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是新旧风俗的变化所引起的伦理道德观的变化，以及由农业合作化运动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农民内心世界造成的影响。作品所占篇幅最多的也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王金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登高的斗争，而是围绕着扩社和修渠而展开的入社和分家。而作者最看重最关心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一样，仍然是年青人的生活 and 他们的未来。小说从马有翼、范灵芝和王玉梅在扫盲班的微妙关系开始，以三对新人结婚作为结束：范灵芝放弃了落后的马有翼而选择了爱社如家的小发明家王玉生；马有翼虽然失去了范灵芝，却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王玉梅；受母亲“不够”影响的袁小俊与王玉生闹离婚后，虽然没能嫁给大姨家的儿子马有翼，却得到了比马有翼更能干的满喜，六位年青人都“终成眷属”。在赵树理的脑子里，仍然还是《小二黑结婚》的思路。

《三里湾》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不是合作化的带头人王金生，而是热衷于个人致富的党员范登高，以及“糊涂涂”（马多寿）、“常有理”（马多寿的老婆）、“铁算盘”（马多寿的大儿子马有余）、“惹不起”（马多寿的大儿媳）、“不够”（袁天成的老婆）等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落后的富裕中农。范登高是村长、老党员、老干部，也算是三里湾的一个能人，因为参加革命早，立过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候算出地主的土地来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接受我就带头接受”。所以，他也有个外号叫“翻得高”。正是因为他在土改中得到了好处，开始热衷于个人致富，甚至开始雇人在外边“倒小买卖”。范登高的形象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在当时应该是有极高的典型意义的，不但表现了当时农村社会中“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还表现了党内日益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在赵树理笔下，范登高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农民，一个精明能干的农民，一个曾经

听党的话，后来想走个人发家之路，结果落了个“留党察看”处分的农民。“在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在政治上，却仅仅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知道一个党员不应该雇工，最怕人家说他是“东家”，在受到大家批评后，也愿意检讨自己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范登高虽然是村长，可在村中却没有什​​么实权，在党内有支部书记管着他，在党外是合作社社长说了算，他也没有用实际行动对抗合作化运动，只是不满意党的批评和教育，不肯放下架子老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赵树理没有将范登高脸谱化，而是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的发家愿望与他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方式，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蜕化者的形象。马多寿一家，由于人多戏多，几乎成了《三里湾》的主角。而实际上，作品中最核心的故事，如扩社、入社、分家等都是以马家为中心展开的，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几个人物“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是马家的自己人，而“不够”也与马家有关，是“常有理”的亲妹妹。因此，马多寿“糊涂涂”实际上也就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大凡有外号的人都是偏于落后的“中间人物”，但都有戏看，都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但这些人物在赵树理笔下，却写得各有特色。“糊涂涂”能成为富裕中农，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精明能干，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保守和糊涂，当然，有时候也只是假装糊涂，他不仅会利用范登高的真糊涂来阻挠合作社的扩建，也会利用自己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来阻挠合作社的修渠计划，还会利用互助组的善意让他们来为自己种田，最重要的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会审时度势，“变糊涂为光荣”，高调表态加入了合作社。在赵树理笔下，所有的农民都是可以改变的，哪怕是像马家这样顽固不化的农村宗法式的封建家庭，也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的潮流而土崩瓦解。虽然他在作品中也写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县委刘副书记的口，多次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三里湾的实际生活中，“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打起仗来”<sup>①</sup>，并不你死我活的。也正因为《三里湾》对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比较温和，虽然它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被改编成同名话剧、评剧、花鼓戏等各种舞台剧和电影《花好月圆》，但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被认为“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

<sup>①</sup> 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载《湖南文学》，1963（1、2）。

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sup>①</sup>。

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然而，赵树理的处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1948年底因《邪不压正》受到批评、1950年因在他主编的《说说唱唱》发表孟淑池的《金锁》而一再检讨，甚至被解职，以及《三里湾》所受到的冷落，也曾使赵树理意识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也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颂歌潮流。为此，1958年，赵树理创作了《“锻炼锻炼”》，想歌颂一下农村中的新生事物，站在青年干部杨小四一边，批评干部中以社长王聚海为代表的“和事佬”思想，让“小腿疼”、“吃不饱”等自私落后的人出点儿丑，但由于他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客观上表现的却是当时农村中日趋激化的“干群矛盾”，将歌颂农村新人还是写成了对农村坏干部的揭露，实际上的效果与自己努力的方向、时代的要求都恰恰背道而驰。因此，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批判，认为这篇作品是对农村现实的歪曲，丑化了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形象。

人们对赵树理越来越尖锐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越来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虽然，老舍、茅盾、王西彦等作家一再为赵树理的作品辩护，但并不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改变赵树理“在劫难逃”的悲剧命运。处在既无法回避，又不愿违心地说假话、唱赞歌的两难境地的赵树理，为更多地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请求去了山西阳城，但在“放卫星”（虚报产量和成绩）等问题上，又十分固执地与县委大唱反调，被看做“神经病”。1959年8月，固执己见的赵树理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投寄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长文，但正好赶上“庐山会议”对以彭德怀为首“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被陈伯达转批给作协党组，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靶子。赵树理后来曾十分尖锐而沉痛地说：“1960年的情况是天聋地哑。”<sup>②</sup>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创作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坚持自己风格的作品。

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①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②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4卷，51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予以彻底平反，并将赵树理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但大连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sup>①</sup>。此后，赵树理还创作了《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和《卖烟叶》等小说，但《卖烟叶》再次被当做“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1965年，他在改定“上党梆子”《十里店》<sup>②</sup>后，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中，几乎没有再写一篇作品。

赵树理是一个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浸淫和“五四”新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始终认为，新文学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sup>③</sup>的创作理想，即以文学的通俗方法，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也不断增强着他的自信，虽然时代在变，他的创作思想却几乎一点都没有变，特别是由于他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坚持用小说的形式表达老百姓的声音，使得他总是“右倾”，一再受到批判。但是，赵树理的真正理想却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革命工作和革命事业。赵树理曾以“助业作家”来纪念“快板诗人”毕革飞，但赵树理“经常以‘问题小说’来界定自己的创作，要到根据地农村和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舆人之论，这不就是‘助业作家’的行为准则吗？”“就像是在做自我总结”，因此，“这顶桂冠完全可以戴到他自己头上去”<sup>④</sup>。文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的一种工具。他能创作出广受农民群众喜爱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而他能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② 《十里店》初稿于1964年，定稿于1965年，发表于1978年5月《人民文学》。这是赵树理自编自导，并亲自谱曲、亲自担任舞台设计的剧本，倾注了他全部心血，自我感觉非常好。作品通过从先进队嫁到后进队的马红英结婚前后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虽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一再修改，但仍难逃厄运，在太原仅上演一场即遭停演。

③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08-10。

④ 杜国景：《赵树理之“助业”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4）。

自觉的农民立场形成了赵树理小说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赵树理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言人，总是能够相当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基层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农民的心理愿望。他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中的坏分子来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小事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同样是描写土改运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明显不同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它描写的不是“土改故事”，而是土改时期的“农民故事”。同样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三里湾》也不同于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不是按当时的政策精神来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把主要笔墨用于描述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恋爱婚姻以及道德观念，批判的主要矛头，只是对准那些对农民危害最大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混入党内的坏分子”<sup>①</sup>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等。这是一般的民间艺人和通过“采风”或“体验生活”来表现农村面貌的知识分子作家都难以做到的。

赵树理把自己的读者明确定位为农民。在“十七年”时期，只有少数作家对自己提出过这种苛刻的要求。比如，梁斌把自己的读者定位为农村中文化程度相当低的识字人，他在写《红旗谱》的时候，有意识地把每章的字数控制在千字左右；而赵树理则把自己的读者定位为不识字的人，他在写小说时总是先读给农民听。只有农民听懂了，小说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为了让农民能够听懂，并有兴趣听，在表现手法和小说形式上就有意识地倚重民间文艺，特别是说书艺术的传统；而为了政治上的作用，在表现内容和艺术趣味上又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工作任务，不能迁就大众的娱乐口味。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为此，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努力反映老百姓爱看的有政治主题的新人新事，而在艺术上又特别注意适应老百姓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他基本上不用现实主义小说常用的“典型化”原则（即在典型环境中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来刻画人物，他的小说中很少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从来不紧紧围绕着一两个主要角色来展开情节，而是继承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评书体”的叙述方法，在漫漫长卷中整体展示芸芸众生般的农民群像，逼真地写出他

<sup>①</sup> 周扬在《赵树理文集·序》中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恶霸地主，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与勇敢。”《工人日报》，1980-09-22。